

广西民族历史 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

广西民族研究所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73

22.573
107
191

广西民族历史 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

广西民族研究所

广西民族出版社

57795

92 第1138号

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

广西民族研究所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星湖北二里八号)

灵山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1.625印张 29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5363—0106—5/K·0011

书号：11138·68 定价：2.65元

序 言

《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第一辑出版了，这是我们在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辑出版任务基本完成后，又一新的科研成果。它凝聚了同志们辛勤劳动的心血，饱含着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多年来的愿望。

我区民族研究工作，是从一九五六年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组成立时开始的（一九六三年改成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三十年来，经历了多少次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坎坷曲折的道路。我们不会忘记研究工作开展之初，无资料，没设备，租民房，住旅舍，从两个铁皮箱开始。下乡调查回来，早住东城，晚搬西街，没有安身落脚之处，二十多年搬家二十多次，其艰苦情况可想而知。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繁荣民族研究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可是，“左倾”思想肆虐的年代，我们的同志被当作“臭知识分

子”对待，长期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更把我们的研究工作推上了绝境，机构被撤销，人员被遣散，资料几乎被全部送去化作纸浆。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

粉碎“四人帮”以后，科学的春天又降临祖国大地，民族研究工作受到了重视。办公地点有了，宿舍建成了，人员编制增加了，几遭劫难的数百万字调查资料编辑出版了。形势一派大好，研究课题不断深入扩大，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更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培育了一批久经锻炼的、具有相当水平的高、中级研究人员，几十年来所企望的“出成果，出人材”的宿愿正在实现。在这里，我不禁想起那些曾经为广西民族研究事业竭尽全力的几位中年研究人员，近年就过早地去世而感到十分痛惜。要是真的“灵魂有知”，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为今天的民族研究新情况而欢欣雀跃。

我已年逾古稀，但长期在广西民委和民族研究所中，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学术研究团体中，和中青年同志们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在他们的推

动和协助下，总算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可说得是“私心窃喜”的。

本书内容，包括民族考古、民族史、民族学、民族理论政策、民族经济、民族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文章；因篇幅关系，仅收同志们研究成果极少的一部分。工作刚刚开头，有了第一辑，必将有第二、第三辑，坚持办下去。如果这个文辑能在繁荣民族研究事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四化”建设中起到一些作用的话，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书所收文章来自作者不同时候的作品，许多原来的观点我们都不作改动。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加上编辑时间仓促，错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景宁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 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剖析……………覃彩菱(14)
- 铜鼓入土原因论……………潘世雄(16)
- 天等崖画与左江崖画关系初论……………卢敏飞(29)
- 僮族源流试探……………白耀天(37)
- 有关“陆梁”的几个问题……………覃圣敏(50)
- 骆越青铜文化初探……………覃彩菱(58)
- 论百越民族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关系
——兼论京族族源问题……………李干芬(75)
- 《粤风·俚歌 僮歌》音义……………白耀天(91)
- 广西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状况探源……………李干芬(134)
- 对岩葬几个问题的探讨……………潘世雄(145)
- 略谈古代汉语中的壮语……………覃圣敏(157)
- 论宋代侬智高是广西壮人……………韩肇明(171)
- 从民族节日来看壮族的历史文化……………卢敏飞(190)
- 中法战争中的广西边疆少数民族……………莫家仁(199)
- 瑶族乐舞艺术发展探讨……………黄钰(211)
- 瑶族原始婚姻的发展变革……………黄钰
黄方平(224)

试论瑶族《过山榜》	李维信(235)
论盘瓠王的崇高美	蓝克宽(247)
明代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	韩肇明(256)
关于南丹白裤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的探讨	梁友寿(273)
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使自治机关 自主权	覃立新(291)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伟大 实践	翁乾麟(303)
关于发展广西边境民族经济若干问题 的探讨	潘文(313)
谈论广西经济发展战略务必增强民族 观念	覃立新(325)
论毛泽东同志关于西藏革命和建设的 思想	翁乾麟(337)
广西仡佬族民间文学一瞥	蓝克宽(353)
后记	(363)

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剖析

覃彩銮（壮族）

南宁地区位于广西的西南部，以郁江为干流的江水自西向东穿流其间。在地势平缓的郁江两岸的台地上，分布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以贝丘遗址数量居多。近年来，广西区文物工作队先后对秋江、豹子头、西津、长塘、敢造、邕勋、青山、江西岸等贝丘遗址进行了发掘或试掘，并在西津、秋江、长塘及敢造等四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批葬式和葬法都比较特殊的新石器时代墓葬^①。这是解放以来广西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墓葬。弄清这些墓葬的时代、性质及其葬俗，了解当时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及人们的经济生活形态，会大有裨益。本文拟就这批墓葬的特点、性质、时代及其葬俗，试作初步的分析。

南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以下简称南宁墓葬），分别发现于横县的西津、秋江、邕宁的长塘及扶绥的敢造等贝丘遗址中，其中西津遗址发现一百余座；秋江发现三十一座；长塘遗址发现十五座；敢造遗址发现十四座。这四处墓葬虽然在地理分布上不尽相同，但墓葬所处的地层堆积，埋葬方法和葬式等方面，则基本相同。它们均处在很厚的螺蚌壳堆积之中，除少部分墓葬发现有浅小的墓坑外，绝大部分未见有明显的墓坑，所见遗骨排列纵

横交错，缺乏一定规律，头向零乱。有的遗骨相互依存，有的骨体残缺不全，还有的身首不相衔接，似受过扰乱；它们应以单人葬为主，只有个别为二人合葬，即在西津遗址里发现有一老一小的遗骨相互依存，似是母子合葬。其葬式以屈肢蹲葬为主，也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和俯身葬，还有个别为二次葬。随葬品普遍较少，一般只有一、二件石器、骨器或蚌器，有的墓葬一件也没有发现。在西津和长塘遗址的许多墓葬里，还发现有一、二件未经加工的片石。这些片石不是遗址里所具有，而是来自附近的石山上，从这些石块多处在人的头骨附近看，不象是偶然失落墓内，而是人为有意置放的。此外，在长塘还发现一处用石子围成长100、宽60厘米的方圻；西津遗址也发现一处以螺蛳壳围成的椭圆形圻，许多遗骨上还撒有赤铁矿粉。

综上所述，南宁墓葬比较显著的共同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墓葬处在遗址的贝丘堆积之中，墓坑不明显；（2）遗骨分布集中，但排列错乱无序，并有残缺不全的现象。（3）以屈肢蹲葬为主，但其它葬式往往与之共存；（4）随葬品普遍较少，还有以未加工的片石随葬。这三处墓葬具有如此众多的共同特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它们之间应有着较为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当表现为同一时期、同一部族，具有相同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在丧葬形式上的反映。

墓葬制度并不是同人类社会一起出现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宗教观念的支配下才开始出现，它如同其它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也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往往不同，主要是由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形成的。任何一种习俗，不可能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融合而逐渐发生变化。就南宁墓葬而言，其墓坑虽然多不明显，但人体遗骨比较密集，葬式多较明显且一致。这些现象表明，当时这一带的居民

对死者已不是随地随便掩埋，而已经有了统一的固定墓地；人死以后，都送到这些既定的墓地里，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埋葬，其葬式已趋规范化和制度化。

如上所述，南宁墓葬均处在很厚的贝丘堆积里。这种堆积，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垃圾堆，是当时人们将捕获的各种水生腹足类动物，剥食其肉后，将外壳遗弃一处，经长期不断积累而形成。因堆积庞大，形似小丘，故称“贝丘”遗址；外国则称为“庖厨”（即垃圾堆）。这样的贝丘，一般都处在人们的住地旁。由此看来，上述发现墓葬的贝丘堆积处，应是各遗址居民的公共墓地无疑。既然是墓地，那为什么尸骨排列又如此零乱无序，且多不见有明显的墓坑呢？是不是当时未加挖掘墓坑，而是把死者置放在地面上就以土掩埋呢？这是不太可能的。据笔者到此类遗址中观察，并对贝丘进行了试掘，发现这些遗址的堆积主要是由大量的螺蚌壳、蚌壳、各种兽骨及杂土组成，结构松散。据此看来，当时埋葬死者时，先是挖有墓坑的；但在葬入死者后，回填的仍是原来掘出的内含大量螺蚌壳和兽骨的杂土，这些杂土与墓坑四周的土质土色并无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雨水的不断填充，加之地层内部产生的挤压力，使墓坑里的填土愈压愈紧密，直至与四周的地层堆积结构趋于一致。这样，原来墓坑的界线便慢慢消失而难以辨认了。再是由于这些贝丘堆积结构较为涣散的缘故，即使有墓坑遗迹，也难以发现。所以在发掘时，往往是见到人的遗骨后，才知道有墓葬。换言之，如果当时未加挖掘墓坑就埋葬，那么，这些呈直立状的屈肢蹲葬是难以安葬并保存到现在的，何况在西津遗址内含螺壳较少之处，仍发现有一些墓坑。但这些墓坑多较浅小。由此看来，南宁墓葬原来是设有墓坑的。

从南宁墓葬排列无序的遗骨、随葬品普遍较少及葬式较杂乱等现象看，似乎表明当时这一带的埋葬制度还比较原始，埋葬方法还比较简单，其葬俗虽已形成（即流行屈肢蹲葬），但还不甚

严格，而这些尚较原始的埋葬制度及简单草率的埋葬方法，是由人们所处的尚较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等因素造成的。

二

当时南宁一带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呢？这从遗址的堆积物及出土遗物，即可窥见其概貌。南宁一带诸贝丘堆积中，不仅有大量的水生动物，如螺、蛳蚌、鳖及鱼等，而且还有众多的陆生动物骨骸，如象、犀牛、牛、虎、鹿、猪、箭猪、獾、狐、麂等。这些堆积厚约二、三米，面积约三、四千平方米。遗址里还出有鱼钩、镞、网坠等渔猎工具，由此可见，当时这一地区的渔猎经济还是相当的发达。但遗址里也出土有大批的石器、蚌器、骨器和陶器。石器以磨光的石斧、石镑、石凿居多，还有一些石杵、石磨盘和蚌刀等生产工具，其中的石杵、石磨盘及蚌刀，显然是农作物的收割和加工工具，而有的石斧、石镑可能已用于农业生产，陶器的出现也与农业有关。据此看来，当时这一带已出现了原始的锄耕农业。但这些工具个体多较细小，器形也还比较简单，而当时这一带基本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遍地古木参天，林海茫茫，草木盘根错节，以上述尚较简陋的工具在这样的土地上进行耕作，不仅生产效率不高，而且收效也很微小。估计当时的农业尚处在原始的初创阶段，生产规模尚小，在人们的生活中，尚未占主导地位，人们主要还是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生。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宁一带的自然条件构成的。

大家知道，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里岗文化，农业经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仰韶文化中的半坡类型更是如此。但南宁地区的原始居民则不然，他们虽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

但主要的还是依靠渔猎和采集经济为生。这是由于两地自然环境不同的原因所致。广西地属亚热带地区，这里不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而且还有着众多的江河、湖泊、沼泽地及茂密的山林，这对于各种亚热带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极为有利。在水中及陆地上，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人们用较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得到这些生活必需的食物。同农业生产比较起来，渔猎和采集活动不仅收效快，而且劳动方式简单易行。在这种自然资源尚未枯竭而仍能供人们索取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舍易而求难。南宁一带的原始居民虽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的生产活动，但已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如果不是较长时期的定居，就不可出现如此庞大的贝丘堆积和如此众多的墓葬。

然而，南宁地区的自然环境虽然有利于渔猎和采集经济的经营，但这种经济毕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其最大缺陷是消极地索取自然资源，而且还要受到气候、季节、资源及工具等条件的限制，不仅收获不稳定，而且往往需要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不间断地参加这种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正是这些劳动，占去了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使得他们终日出没于深山密林及江河之中，至于别的与此无直接关系的事，大概就难以顾及了。对于死去的亲人，也只是以比较简单方式进行埋葬。平常制作的工具，除了供给人们日常使用外，没有太多的剩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把自己手中的工具用来给死者随葬。因为两者比较起来，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的生活重要。就是死者生前使用的工具，往往还拿来给其它成员继续使用。鉴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生产方式及墓葬制度的原始，人们对于随葬品多少、优劣似乎还不十分讲究。这大概就是墓葬里随葬较少的主要原因。但在西津和长塘的遗骨旁所发现的石块，它既不是人们无意失落，也不是个别现象，且多处于死者的头骨旁。据此看来，这些石块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随葬品。由于石块是当时人们制作石器的原

料，而石器又是人们从事生产的重要工具。以石块给死者随葬，其用意可能是给死者到另一个世界准备制作石器的原料，希望死者用自己的双手，去制作生产需要的工具。这种现象似乎与广西壮族把稻谷装在罐里为死者随葬，意在为死者到另一个世界准备耕种的种子相似。类似酉津、长塘以石块随葬的现象，在法国及意大利的石器时代遗址里也有过发现。在法国多尔涅省的莫斯特发现一具青年尸骨，其姿势是侧身屈肢，头下垫有一层燧石；在意大利蒙色西的一个山洞里，“一具尼人的头骨安放在一个洞穴里，人头周围排列着许多石块”，“因为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们的锐利武器，而石头又是制作石器的原料。所以他们用石头随葬，以期望死者高枕无忧，安然入睡”^④。因此，南宁墓葬中有以石块随葬的用意，大体应与此类同。此外，以石块代替石器随葬，既可节省人们制作石器所要耗费的劳动和时间，又能达到用石器所不能达的寓意。这种力图使整个葬仪尽可能节省人力物力的现象，还表现在墓地的选择方面。

如上所述，南宁墓葬均处在遗址的贝丘堆积里。当时人们为什么选择贝丘作为墓地呢？这也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工具的简陋有关。因为贝丘中的土质结构比较松散，它比其它板结的土质更易于挖掘，在当时掘土工具还比较简陋的情况下，把死者埋葬于这些结构松散贝丘堆积上，挖掘墓坑时就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而况这些堆积就在居住地旁，符合当时选择墓地的原则。但埋葬时，由于葬地内缺乏严格的布局和统一的规划，随着埋入死者的不断增加，原有的墓上又无明显标志，这就难免排列无序，相互扰乱和遗骨残缺不全的现象。

三

关于南宁墓葬的时代。由于墓葬里出土的遗物较少，要断明

墓葬的时代，首先要弄清遗址的时代。而墓葬里出土的遗物，其形制特征均与遗址出土者相同，说明墓葬与遗址的时代基本是相同的。

关于西津、长塘及敢造等遗址的时代问题，由于这些遗址只有单一的文化层堆积，未见有明确的地层迭压关系，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虽较丰富，但又缺乏时代特征较典型的器物。因此，对于这些遗址的时代，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有人认为属新石器时代早期^②，有人认为属新石器时代中期^③，也有人认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④。出现以上歧见，主要是由于广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缺乏明确的地层迭压关系，各时期的文化特征尚未弄清等原因造成的

不久前，柳州市博物馆在市效鲤鱼嘴发现了一处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文化层相互迭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⑤。这在广西还是第一次发现。遗址面积虽不很大，但出土遗物则较为丰富，上、下文化层出土遗物的特征，也有较明显的区别，它们应代表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鲤鱼嘴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推定南宁诸贝丘遗址的时代，提供了比较的依据。

鲤鱼嘴贝丘遗址上文化层出土的器物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蚌器。其中以打制石器居多，共67件，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石核及石片等；磨制石器较少，仅6件，器形有斧、镑、砺石等。陶片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均手制，火候较低，胎较厚，以饰粗细绳纹为多，次为划纹和弦纹，也有的素面无纹饰。但陶器均为碎片，无完整器物。下文化层内含物与上文化层基本相同，但堆积中的螺蛳壳，个体远比上文化层硕大，且表面发黄。出土器物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骨器等。其中以打制石器居绝对多数，共117件，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及石核等，磨制石器仅发现一件石斧，且仅在刃部磨光。陶片也以红、黑色的夹砂粗陶居绝对多数，泥质陶仅发现1片。陶片火候很低，质软，

胎壁厚，制作技术比上文化层原始，纹饰也比上文化层单纯，仅见有绳纹一种。鲤鱼嘴遗址中的上、下文化层，无论是堆积内所含的螺蛳壳的个体、颜色，还是石器的形制、加工技术、打制和磨制所占的比例及陶器的制作技术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它们之间应有着时代上的早晚区别。下文化层的打制石器，在器物的种类及制作方法，都与广西田东新州及百色上宋村所发现的打制石器相似^①，具有浓厚的旧石器文化特征，但又有少量的磨光石器及陶片共存，说明它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但这些磨制石器和陶器不仅数量少，而且制作技术还相当原始，这又是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特征。上文化层虽仍以打制石器为主，但磨制石器数量明显增多，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技术也比下文化层进步。发掘者认为：鲤鱼嘴遗址下文化层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上文化层的时代则为新石器时代中期^②，我们将南宁地区的西津、长塘和敦造等遗址出土的遗物与鲤鱼嘴下文化层相比较，不仅磨制石器的数量较之为多（约占出土石器总数90%，而打制石器仅占10%），器形丰富，而且制作技术也远比鲤鱼嘴下文化层进步，即多通体磨光；陶器种类及制作技术亦如此。而与上文化层相比较，除了打制石器和磨光石器所占的比例有些差别外，在石器和陶器的种类及制作技术方面，基本是相同的。因此，南宁贝丘遗址的时代要晚于鲤鱼嘴下文化层，而与其上文化层相当，约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晚一阶段或中期的早一阶段，其墓葬的年代也在此列。这种推断也得到碳-14年代测定的支持。南宁地区同类的豹子头贝丘遗址出土的螺蛳壳，经碳-14测定为距今10720±260年^③。当时这一年代数据公布后，考古界为之一震，因为其年代如果真实可靠，那么，南宁豹子头遗址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远比浙江河姆渡和河南裴里岗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河姆渡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4360—4315年；裴里岗为公元前五千年左右）^④。但从豹子头遗址出土

的遗物看，似乎与碳-14年代不符。因为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在制作技术上已具有诸多进步的因素，不象是新石器时代初期所能具有的，因之，其螺壳测出的年代要比遗址的实际年代早。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误差呢？目前的解释是，在“石灰岩地区，由于附近流水中含有大量由石灰岩溶化而来的几乎不含放射性碳素的古老碳酸盐的影响，所以碳-14一般要偏高”^⑪；后来“用漓江产现代蚌壳测定的结果，同样是偏老的，证实这一假说的正确性。”^⑫近年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14实验室和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对广西地区各种陆、水生的动植物样品进行了测定，结果证明“陆生物、植物样品（蜗牛除外）的碳-14年代不受石灰岩特殊环境的影响，至少没有显著的影响，水下生长的动、植物样品的碳-14年代显然偏老1—2千年”^⑬。后来又对南宁豹子头遗址四个不同深处的螺壳样品进行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9985±200年、10155±200年、10565±200年、10735±200年^⑭。与敢造遗址邻近的江西岸贝丘遗址也在不同深度（即距地表10、25、110厘米深处）采集螺壳样品进行年代测定，结果分别为距今9385±140年、8950±130年、9245±140年^⑮。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测定的螺壳样品虽出于不同深度，但年代是接近的，表明遗址的文化堆积同属一个时期。“如果考虑到螺壳平均偏老1500年左右，扣除此数以后”^⑯，豹子头遗址的年代距今八、九千年；江西岸较之略晚，约距今七、八千年。这些数据与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是相符的。

从南宁一带发现的贝丘遗址看，当时的郁江两岸，已较密集地分布着原始居民的聚住地，居民们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看，与上述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应是母系氏族社会。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生产方式尚较原始，一个人如果不与其它人结成一定的关系，以从事生产，那就难以生存。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组